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钟敬文 著

芸香楼文艺论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芸香楼 文艺论集

钟敬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芸香楼文艺论集/钟敬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

ISBN 7-5059-2332-3

I. 芸… II. 钟… III. 文艺评论-中国-选集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394 号

芸香楼文艺论集

钟敬文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3.5 印张 312 页 532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册

*

ISBN 7-5059-2332-3 定价:63.60 元

I·1702

精神力量与学术成果(代序)

金开诚

我和钟敬文先生虽然从未在一起工作,但对他的为人品学问心仪四十年,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私淑弟子。尤其因为先妻屈育德同志五十年代后期是钟老的研究生,因此我便常常能够得到钟老在学术上的指教和学风上的熏陶,所受教益至为深刻。因此,在钟老的理论文集辑成之际,他要我作序虽不敢冒昧应命,但写一点学习中的感想,还是理应勉为其难的。

钟老是学界山斗,他在学术上的丰硕成果,久已为海内外学人共钦。但学术成果毕竟有章可循,有迹可求。在我看来,海内外学人在学习研究钟老的学术时,更应该思索他何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那是必须透过形迹看到更为内在的素质才能感悟的。

正像一般人的学习与工作都离不开智能因素与非智能因素的相辅相成,钟老的学术成果固然直接取决于他掌握材料的广博与丰富,创造思维的精深与活跃;但更为内在的因素则在于他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驱动他在学术上终身求索,老而弥坚!钟老现在已经年过九十了,但他仍勤学深思,孜孜以求,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他那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得更加辉煌。

那么,钟老的内在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四十年的了解,我想可以概括为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和对文化创造的顽强追求;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驱动着钟老进德有志,修业无倦;呕心沥血,奉献学术成果;尽心尽力奖掖后进,培育新人;大声疾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强调培育“四有”新人,其第一条即是“有理想”。观察钟老漫长的社会经历和学术生涯,可以清楚地印证只有崇高的理想才能产生坚韧不拔的毅力,从而驱动人们长期投身利国利民的壮举。

钟老在学术上的贡献,当然以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中,最有开拓性与创造性,是人所共知的学术权威。但是,人们就从现在这部文集中,也可以看到钟老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很宽广的,他的巨大成就并不限于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研究。这部文集中所收的著作“主要是谈论一般文艺原理和个别作家、作品的文章”,而内容竟涉及九个方面,可见其视野的宽广和知识的渊博。再从这九个方面的文章中,又可以看到钟老在理论建树中的两大特点:

第一,他是在对中外古今历史文化的广泛把握中来谈文学原理的。文学创作本来就只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又是随着历史长河的流动而变化发展的。因此,带着有关历史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思维的背景来审视文学创作,就更能给人以广博感和深邃感,使人在文章之外还多有联想与感悟。这与那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式的就事论事乃至坐井观天之作是大异其趣的。

第二,钟老有相当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写过不少诗与散文;后者尤有独到之处,在现代文学史上卓然成家。因此他深知创作的甘苦,洞悉语言艺术的奥妙。这样,他所著的理论文章就

多有鞭辟入里之言，而少皮相空泛之论。许多论述虽出于几十年前，但现在仍对人很有启示。

另外，钟老的理论文章在语言表述上也大有值得人玩味学习之处。他的论文风格严谨精炼而不无雍容风度，清新脱俗又平易近人；这与那些使人目眩心烦的所谓“新潮”之作恰成鲜明的对比。

著述要有“本钱”，读书也要有“本钱”，“本钱”充足才能获致大益。笔者深愧“本钱”微薄，故而不能从钟老的大作中多多获益，只好说一点浅薄之言来表表心意，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在学术研究中永葆青春。

自序

文艺理论是文艺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专门研究文艺的学者,对它自然要穷心尽力。一般的作家,由于拥有创作经验或深有感触,不免要染指到它(我有过一种偏见,认为有成就的作家的文艺谈,往往是最能打中要害的)。就是许多人文科学者,乃至一般的读者,也可能对某些文艺现象,抒述一下自己的感想或看法。这种感想看法,自然不会有系统和符合专家们的惯想。但它在理论上,却可能是一星火光——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我自己数十年来的主要职业是在大学里的文学院或中文系教书。我在文艺理论的某些方面,例如民间文艺学或诗学,用过较多功夫,写过不少文章。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我究竟不是一个专搞文艺理论的行家(至少,在学艺界一般学者习惯的看法上如此)。因此,我大概只能算是一个与文艺理论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的学者。这点也许正可以从我的这个集子的许多文章中得到证明吧。

我开始写文艺理论的文章,比我写作新诗、散文,似乎稍迟一些。时间大约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期。首先,我写作谈

论民众口头文学(主要是歌谣)的学术性随笔。稍后,才扩展到对作家文学(包括文学史问题)的谈论——性质上当然多是感想式的。关于后者,记得到杭州初期,由于上海一家书店编辑的约稿,我曾经出版过一本文艺随笔、论文集:《柳花集》(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以后比较集中精力去搞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的搜集与探索工作。这些时候,虽然在学习上,以及教学上,并没有与作家文学及有关理论脱离(我热心阅读普列汉诺夫、梅林等的文艺理论著作,就在那些时期),但是,在理论文章的写作上,显然向民间文艺学及民俗学方面倾斜了。谈论一般文艺理论或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例如《饮水词作者的友情》等,就是例子),但已稀落如晨星、秋叶了。

在东京留学时期,为了学业,我勤奋地阅读着神话学、童话学、民谣学以及语言学、宗教学、原始文化史等著作;同时,也耽读着国外著名学者们的文艺理论著作——古代的和现代的、西欧的和日本的。从思想内容看,所读以马克思主义派和资产阶级进步派、民主派的著作为多。前者如高尔基、弗里采、藏原惟人等,后者如罗曼·罗兰、莫里斯等。但在写作上,跟三十年代开始到去国时一样,那种重要位置几乎全被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占去了。我动笔非不勤奋,但是内容不是关于神话、民谣的,就是关于民间文艺学原理等方面的。这种缺陷(如果要说是缺陷的话),直到后来一些时期才得到补偿。

中日战争是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一场空前大灾难,同时又是锻炼我国人民思想和性格的一个大熔炉。它对于广大群众是如此,对于我个人也一样。它把我这个书生从书院里驱赶出去,无情地(从另一方面说,是可感谢地)把我推进了那火辣辣的现实

斗争中去(它不仅是对外的战争,中间还夹杂着内部的斗争)。作为一个政治战士(当时我置身于战区政治部),面对着民族生存斗争的需要,我不能不披肝沥胆去操起那用作战斗武器的宣传文艺!我大力写作和呕心口讲,把自己所知道的真理与热切希望,告诉抗日青年与民众。在这本集子里,现在还多少保留着当年笔书和口讲的文字、声音的一些痕迹。

近日有的同志,看了我这些半个世纪前的文艺小论和即席讲话的记录稿,颇觉惊诧。那个作者和讲者,好像跟他向来所认识的我对不上号,更不用说跟眼前的我的形象距离之远了。在那段时期里,时间不长,所写作(包括讲话稿)和遗留下来的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也不多;但它发挥了我的热情和良好知识,鼓舞过当时的青年读者,它也影响着自己以后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它将永远成为我生命史上的一份精神财富。

抗日战争后期,我被迫从前线退回学院。我重新回到中山大学任教。那时它的校址,临时迁至广东与湖南接壤的一个小市镇——坪石镇,粤汉铁路在它的附近通过。它依傍着武水,市上只有一条商业街,人口也不多。我一共在那里住了四年,直到1944年底,日军企图打通粤汉线,我们才随校转移到更为穷僻的连县三江圩,这些时期,我在文学院教的是理论课(文学概论和诗学等)。因为工作的需要和条件比较便利,对于文艺的一般原理和某些作家、作品,自然也考察和探索得多些深些。另一方面,当时桂林正成为南方的一个新兴文化城,许多文艺界的新旧朋友(像聂绀弩、陈原、彭燕郊等)都逗留在那里办刊物、出丛书。他们也常常寄来书刊,并通信谈论文艺和为刊物约稿。我自己也有些关于文艺的意见要表达。因此,我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还刊行了一册专著,尽管它的篇幅并不大(《诗心》,警句式诗论集,1942)。稍

后，我又编纂了一个自己的散文集，收录了一些谈论文艺的文章，以及文艺性的短文、随笔，名字是《新绿集》。它多少表现了我那时对文艺的一些看法和主张。但它的运气不好，始终没有机会与广大读者见面。现在，在这部集子里，还保留着它的一篇序文（《新绿集自序》）和一些零散的篇章，如《我与诗》、《关于拜伦》和《纪念托尔斯泰》等。

我这时期的文艺谈，在内容上，似乎有它的明显特色。有些篇章，在道理上挖掘得深些；有些则还蕴含着一种激情或情愫。而文词上一般也比较严谨、精炼。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跟我历史的、适逢其时的生活变化以及处境的苦闷等分不开的。它们虽然不是什么长篇巨制，不能够概括在那个伟大时代里自己的全部文艺思想，但在那些小篇零语中，也多少表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触和思索的结果。那种文章，我以前没写过，以后也再写不出来了。它是我处在当时的特殊境况下的精神产物。

日本投降后，我随学校从连县（这是中大因为日军的胁迫再次迁驻的地方）搬回原址的广州石牌。在那里只住上一年多，又为反动政治势力所迫，不得不逃往香港。我在那所民主党派合办的达德学院里继续我的教书生活。二十年代后期，我曾一度到过香港。比起当时的情形，这回的感觉大不相同了。它在我们眼里，不再是什么金气逼人的商业都市，而是一座富有活力的政治都城。自国民党顽固派颁布他们的“勘乱令”（1946）后，共产党以下的各民主党派原设在国统区的机关都被迫撤离，除中共的以外，大都转移到这个海外岛屿。一些具有新的政治倾向的学校相继在这里开设起来了。许多从未出现的进步报刊也如潮水和山泉般地涌起。反独裁的政治活动和民主的、进步的文化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达德学院是一所政治色彩很浓厚的大学，无论是教师

还是大多数学生，头脑中都有反对当时大陆政权的强烈意识。我在那里，既是传授专业知识的老师，也是政治上共同作战的成员。

在这种环境下，我不能不经常执笔。除了那些响应民主运动的表态文章之外，就是要回答校内外众多刊物的索稿。那时候，当地文艺一类刊物比较重要的，有《文艺生活》、《大众文艺丛刊》及《小说月刊》等（我自己还主编了一本《方言文学》）。此集中收录的《回忆郁达夫先生》、《海涅及其创作艺术》、《方言文学的创作》等，就是在上述刊物上发表的。

这时期我写作的文艺理论（或与它有关的）文章，性质上主要有两方面：（一）回忆已故现代作家和谈论古典作家的，（二）提倡与探讨方言文学的。关于前者，仅忆朱自清先生的我就一连写作了三篇（分头发表在当地三个刊物上）。关于后者，在短短一年中，我一共写了长短不一的六篇论文。这除了方言文学问题是当时当地文艺界的讨论热点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那时担任着两广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的职务。

除了上述两种性质的文章之外，我当然还写过另一些内容性质的论文，例如有关外国进步作家和民间文学的等等。总的看来，我这一阶段在香港青山（地名）所写作的谈论文艺的文章，不但数量上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阔，理论思想也比从前有些发展。我在这方面活动的历程上，显得成熟一些了。环境和生活的改变，对于一个人文艺思想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1949年5月，对于我的生命史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时我跟许多原来停留在香港的文艺界同志，响应革命政府的邀请，回到人民首都北京。忙于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应聘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重操我的旧业，同时在北京大学

(那时校址还在沙滩)、辅仁大学兼课。哪知在北京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在这段不短的岁月里，我所经历的几个阶段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这暂且不去细谈了。我只谈谈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活动经历吧。总的说来，不管在“文革”之前或之后，我所写作的文艺理论文章，主要都是关于民间文艺学的。在这门学科里，除了那些泛论民间文艺原理及神话、歌谣等专题论文之外，我还开拓了这方面的一个学术史园地。自然，此外也写作了一些关于作家生平和作品的谈论文章，它们有的被收入这个集子里。这类文章虽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但不免多少有涉及理论之处，有些地方还可能闪烁着理论的异光。

在这大段时光里，我所表现的文艺思想，既有对过去已经存在的观点的继承、发展，也有新生的因素或对过去思想的修正。这种现象，在我几年前所写的《诗歌的功用》和近日所写的《别有深情一万重》等文章中，大约可以窥见一斑。

从二十年代中叶以来到现在，即将七十年了。搞一般文艺理论，有些时期是我的正业，例如第二次在中大和后来在香港教书的那些时期。但在其它许多时期，它只是我的副业。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的理论活动代替了它的位置。当然，我要郑重补充一句，这种情形，在任何时期都不是绝对的。

其次，在民间文艺学之外，我对一般文艺的考察和探索是相当认真的，写作的篇章也不能算太少。但现在看来，这份对缪斯的敬礼总嫌微薄。我今年已经九十岁，写字不免手颤，脑子的思考能力也大大减弱了。看来，事情已成了定局，不能再改变了。尽管如此，我仍觉得这个集子有它存在的意义。首先，它多少反映了我所经历的时代和我所处的社会现实。不管是文艺创作或文艺理论，它主要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反之，它也必然要直

接地、或曲折地反映出那产生它的母体——清晰地、或者朦胧地。我经过的时代和经历的社会，是相当绵长和复杂的。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具有人类史和社会史的某些特殊性的。因为它的背景是英雄辈出、圣火烛天的时代和社会，同时又是凶神肆孽、群魔乱舞的时代和社会！我这方面的文章，一般虽没有直接加以反映，但在理论的背后不是可以理会到那些神圣光圈与憧憧鬼影吗？这种作用，自然不是我的文章所独有的，但无需否认，它多少起着这种作用。这应该是它存在的首要意义。

再者，我的这些文章在反映所经历的世界的同时，也反映了在这一时空中产生和存在的“特殊的我”。这个我，是大时代、大环境中的一个。他既有与某些同时代人共同的普遍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特殊性。我个人的家庭、个人的生性、个人的教养和种种经历，都使我在时代和一般社会环境的共通性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性来。在漫长的时代和纷繁的环境中，只有“一个我”，没有“第二个我”——像戏台上所出现的“双包公”那样的。这个独有的、特殊的我，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我一生的活动中，当然也反映在我一切的精神产物里——在诗歌中，在散文中，也在谈论文艺的文章里。一个文艺作家固然能够让他的作品反映自己的特点；一个有个性的、思想和艺术比较成熟的文艺理论家，同样能够用他的议论和文词去透露自己的特点。我的文艺理论文章，虽然不能跟那些有卓越思想和才能的文论作者相比，但是，我决不相信自己这方面的产品，只是些无生气、无个性的陶鸡土偶。它多少要反映出这个“特殊的我”——我的性格，我的素养，我的理想、情趣和生活、遭遇等。

总之，我这个文艺论集，尽管价值不高，但作为时代、环境和个人特点的反映，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产物，它是可以存在的，甚至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这个集子在编辑过程上是有一段历史的。最初(大约是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从长沙来京的彭燕郊同志,首先提议编纂它,并且把有关的稿子带走。过了些时候,他重来京时,还了稿子,并附上他的选目,那是他花了精力拟出来的。但我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把它搁下了。过了一些年,又承同事刘锡庆教授费神阅选了一次,好像也拟有一个篇目(我顺便说一句,刘教授是一位独具只眼的文学编选家)。但是结果仍然没有交出稿子去付印。后来,学校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治国同志,也审阅了这份稿子,认为应该付印,并一再列入了出版年度计划。但是,到头来,稿子还是躺在我的乱稿堆里。幸好,它始终没有遭到耗子利齿的“批判”。在这里,我要坦白说一句,这种拖延的责任,主要应该由我个人负担。对于那几位朋友的热心相助,我只有永远铭感和抱歉而已!

蹉跎复蹉跎。忽然,柳暗花明,眼前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大约两、三年前吧,张聚才同志来寓,谈他们出版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的事,顺便提及我这部文艺论集的稿子。他说,出版社知道我有这样一部稿子,他们愿意出版。听了这番话,我心里的确动了一下。这部稿子虽从动议编辑到实际编纂,经历了几位同志的口和手,但至今仍被搁着,甚至几乎被我淡忘了,现在来了倘然的主顾,怎么不认真考虑一下呢?我当时原则上答应了,但说要过一些时才能交卷。后来,我请杨占升教授重新编审一下,并把近年所发表的有关一些文章也交给了他。经过几个月的细心审阅,他草拟出一个新的篇目。但是,这时中间又插入了另外一件事,妨碍了这项工作的迅速进程,那就是北师大出版社为了庆祝建校九十周年和我的同龄诞生纪念,要印行我的“诗论集”(这是编辑同志指名索要的)。我的诗论稿子是文艺理论论文稿子的一

部分，它杂在那部正在编辑中的文论集的稿堆里。因为诗论出版是要争取时间的，我便请杨教授先把它编选出来（附带说一下，它已于今年5月出版了，名称是《兰窗诗论集》），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集子的交稿期限再次拖延了（这中间自然还有我自己的校阅和写序需要时间的问题等）。

现在，这个集子的编辑手续已经完成，我的序文也就要完成。集子交稿的时间即在眼前了。

在这里，我且说明一下这个集子里所收录文章的去取方面的考虑吧。

数十年来，我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像大家所知道的，大部分属于人民口头创作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记得在二十年代后期，我就出版了《民间文艺丛话》（1928）的短论、随笔集。近年来，又陆续刊行了《民间文艺谈藪》、《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和《新的释程》（它包括一部分民俗学的文章在内）。关于一般文艺原理及个别作家、作品的谈论文章，我所写作的又以属于诗学方面的居多。刚刚出版的那部《兰窗诗论集》已收录了其中一些比较有点意义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谈论或记述中外作家、作品的文章（这类文章，不仅本身文艺性较浓，也多少涉及文艺理论问题），也大都收入近年刊行的《钟敬文散文选集》及即将出版的《钟敬文散文》等集子中去了。

因此，本集子所收录的，主要是谈论一般文艺原理和个别作家、作品的文章。但是，为了使这个集子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我生平的文艺思想和作业，不得不从上述三方面的集子里各选录少量篇章放进这里面来。这不仅使集子里的文章，在题材、体裁等方面涉及得更广泛些，也多少增重了集子内容的质量。一般读者和编辑同志，想都能够同意我的这种做法吧。

临末,我有义务,向本书前后几位编选者和为本书作代序的金开诚教授,谨致诚恳的感谢!文联出版公司的负责同志,肯出版这种在经济利益上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的书,同样是值得我感谢的!

钟敬文

自序于西山八大处疗养院

1993年8月3日,时年91岁。

目 录

精神力量与学术成果(代序)	金开诚 1
自 序	1
天问室琐语	1
谈艺录	17
文艺琐语摘录	27
寸铁摘录	32
风格论备忘	37
略论格言式的文体	
——《寸铁集》自序	49
《文艺新地》发刊词	57
文艺批评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61
文学的用处	
——蛛窗文话之一	65
与艺术工作者的谈话	
——在一个艺宣队的留别会上讲的	74
青年政治工作者与文艺	80
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	85
历史的公正	
——关于《耶稣传》与《何谓艺术》的遭遇	91